

## 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徐海燕、陈海莹、郭静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2005年11月18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国际合作局联合举办的“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俄两国政治学界的首次双边学术会议。这次学术研讨会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学许多领域的内容,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 一 中俄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 (一) 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对新中国50多年来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概括总结,指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在理论上的反映。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新中国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同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少挫折。例如,1952年前后对政治学整体上进行简单化的全盘否定,上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以及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等通过对动乱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然而,也有许多学者视西方政治学为正宗政治学,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已过时的错误认识。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他还列举了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些前沿和重大问题,并介绍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学科的学术发展趋势,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任重道远,需要有一支真正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的不断努力。

#### (二)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学研究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学研究情况是多数中国学者感兴趣而又比较陌生的领域。与会学者回顾和反思了俄罗斯走过的艰辛的探索历程。

苏联解体前后,激烈的政治变革和政治动荡引发了俄罗斯社会许多力量投入到政治学领域。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俄罗斯政治学领域研究和教学人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学科和专业:一是历史专业,特别是世界现代史专业;二是科学共产主义专业(即科学社会主义)或苏共党史专业,一般以高等学校教师居多;三是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四是国家与法专业的某些研究人员;五是来自部分新业或原苏共政治领袖的秘书和助手等。

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俄罗斯社会的改朝换代相适应,西方自由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成为时髦的“学术主流”,原苏共理论家也先后抛弃马克思主义立场,开始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共党史等相继改名,教师纷纷改行。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杂志充斥西方话语的文章。90年代末期,随着叶利钦自由主义西化改革的失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潮上升,俄罗斯政治学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开宣扬走西方道路,鼓吹西方民主自由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弱,且不得人心,一种主张探索俄罗斯自主道路的“亚主义思潮”影响越来越强。近两年来,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学者逐渐增多,一些高等学校教师由过去不敢引用马克思理论,到公开宣讲。莫斯科大学等高等学校的一些青年学生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组织。

### 二 中俄两国政治进程比较

#### (一) 中国的民主道路

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从解读中国式民主的目标,中国式民主的实质,中国民主的形式和中国式民主的实现道路以及判断中国式民主的标准入手,提出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位一体”的中国民主的实现形式,是中国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逐步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种民主政治式。

#### (二) 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继宣教授指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

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我国政党制度有显著的特点和显著的优势,但是它现在的这些特点和优势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阶段及目前发展水平的限制造成的。关于政党与政权中的竞争性参与问题,王一程指出,竞争性参与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形势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孤立看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宋月红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及自治能力建设。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区域自治形成一定的挑战与考验,论述了从经济社会管理上加强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的观点。

俄罗斯学者对所关注的中国民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德·斯米尔诺夫研究员将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化,依法治国,社会生活的民主以及整个管理过程的一些民主化等几部分。

有关中国新兴企业主阶层的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各抒己见,不乏交锋与争鸣。德·斯米尔诺夫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社会的分化,新出现的阶层以及这些阶层所代表的利益引起的一些矛盾,是中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有俄罗斯学者研究认为,建立一个广泛的中间阶级应是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邓小平改革使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对此,房宁指出要以一种现实的态度对待中国社会出现的分化,同时强调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不能够改变。

### (三)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改革

关于20年来苏联-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历程,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威·斯米尔诺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华分析。

威·斯米尔诺夫介绍了民主政治神话在俄罗斯的破灭过程。首先是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下,戈尔巴乔夫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导致了苏联垮台和苏共解体。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权开始的俄罗斯改革旨在全面拆除苏联的社会体制,实际上是一场“反革命”随之搭建起来的是一种介于法国的总统制度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之间的政治体制,他将其概括为“新封建主义”体制,并指出改革的后果是“公民的部分人权和公民权利受到了很大的侵犯和损害”。他列举了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权钱勾结现象,描述各地分离势力的膨胀,认为俄罗斯跌入了如亚、非、拉美一些国家那样的“发展陷阱”。普京上台时,俄罗斯畸形体制已经定型。普京着手进行调整,提出新的国家观,着手加强权力上下的垂直关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法院审判体制,规范调整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实行地方自治等。但改革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张树华研究员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划分为3个阶段,即“你死我活”的“政权大革命”阶段、“你争我夺”的“财产大革命”阶段和普京开始的治理和整顿阶段。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表面的“民主与进步”已掩盖不住实际上的政治混乱和衰退。经过10多年的政治动荡和政治体制转轨,俄罗斯在宪法上明确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消了一党制,承认思想领域的多样化和言论自由。然而,由于多年俄罗斯动荡、冲突不断、腐败盛行,再加上经济困难和社会治安混乱,人们开始怀疑“民主派”宣称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怀疑“西方式民主”能否解决摆在俄罗斯社会面前的众多难题。上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社会陷入各种危机之中,一些领域甚至濒临灾难境地,政治领域倒退10几年。

## 三 关于民主化及民主的道路等问题

### (一)民主化问题上的误区的反思

民主问题是一个历久不衰又备受关注的话题。张树华研究员分析了中俄民主发展观与中俄民主发展之路的差异以及共性的问题。他较上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民主发展观与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两个新概念。他认为,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应有4层含义:首先,政治发展进程、经济发展进程、社会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发展进程应该是一个和谐、统一的发展进程;其次,政治发展观本身包含政治的发展、进步与政治的衰败、倒退两层含义;再次,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一样,是可以衡量的;最后,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包含民主、效率、稳定3组和谐的、协调的和共同的发展的价值观和指标体系。他还列举了在民主化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主要为将民主简单等同于现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将“民主”口号化;将民主概念过于片面化、“意识形态化”;过分强调民主的普遍性,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将民主抽象化、庸俗化,将“民主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患民主形式崇拜症,特别是将普选与民主等同起来、将民主绝对化等。他指出,正确的民主发展观主要包含有以下几个基本思想:(1)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2)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是有害的。(3)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民主的发展道路是多样的。

近年来,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出现了“有效民主”、“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等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关注。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西方为模式建立的民主体制、多党制,既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还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实质上成了装点寡头资本主义的门面,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普京对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反思后认为,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社会的民主超越了现实,是偏激和幼稚的,开始寻求一种“有管理的民主”,与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可控民主”。

而“主权民主”的出现则是对外为应付西方愈演愈烈的民主化攻势、对内为了避免俄罗斯国内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危险而提的。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加强国家权威与维护民主、保障自由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对此,普京着力整顿政治、经济秩序,通过改用地方

任命制、调整中央、地方间财政分配比例、联邦主体合并等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举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威·斯米尔诺夫认为,这从客观上也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对以往秩序和稳定的怀念。

与西方学者对普京民主改革的批评不同,张树华研究员充分肯定了普京时期的政治发展。会议提出,由于俄罗斯在主权民主问题上还面临着挑战,在走向民主和民主发展之路的问题上,中俄两国学者应该多交流,多对话,增强自信,增强两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声音。

## (二)关于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等问题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联合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的。它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关于社会问题,俄罗斯学者指出它是目前俄罗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表现在实践中,普京提出建设俄罗斯需要的公民社会,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他还下令成立社会院,负责监督各级权力机关施政情况,并担负社会监督任务。但也有学者对社会院的成立提出质疑,认为它仅是一个精英组织,不能真正代表公民的利益。

关于非政府组织问题,两国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俄罗斯不同部门对非政府组织有不同意见,如司法部与人权委员会的意见就相左。此外,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符·冈申介绍了西方国家对原苏联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控制情况。指出这一情况使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职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不是协助解决发生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问题,而是操纵社会舆论,传播西方价值观,培养现行政府的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威胁社会稳定。他认为中国政府采用的是一种较为严格的控制,使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批评者,而是作为补充,起到辅助作用。对此,他认为中方的经验值得借鉴。

## 四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是中俄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十分关注的课题,也是本次会议讨论频度最高、最热烈的议题之一。与会的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给俄罗斯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而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双方都有一些深入的有见地的和有新意的认识。

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领导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威·斯米尔诺夫就指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权贵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勃列日涅夫后期社会垂流流动停下来之后,苏联所谓的权贵完全丧失了和社会老百姓对话的能力。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口号不仅没有付诸实施,甚至走向了反面,导致政权和民众之间严重脱节。也有学者对此持有疑义,符·冈申认为1985年商品短缺非常严重,民众对戈尔巴乔夫不满意,结果导致了革命,而在此之前党和人民是一致的。有学者比照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固民族的团结互助,维护祖国的统一,指出苏联时期很严重的民族问题发生了危机,是解体的主要诱因。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叶·彼沃瓦洛娃认为苏联解体主要的原因是搞“公开性”,苏共对待历史问题出现严重失误。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符·费德罗夫则从另一种立场上描绘了当时苏联解体的情景:(1)苏联的体制在其存在后期完全不能够进行自我改革,而且改革之初也没有设计出一种完整的改革模式。(2)苏联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确前进的能力。(3)叶利钦所谓的主权化的过程。(4)到1985年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已经完成丧失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5)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全民选举,极弱化了权力基础。(6)到1990年,国家手中资源严重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吴恩远研究员针对当前社会上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流行观点,如苏共严重脱离群众,干部队伍出现腐败,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阻碍等说法,进行了一一探讨,评价了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批评了目前学术界流传较广的一些有关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期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在分析苏共历史上弊端的时候,还要注意到其取得的成就,需要辩证地、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问题。

## 五 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时期政治的分析与反思

如何分析和反思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俄罗斯改革历程是当代中俄政治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这次会议中俄双方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威·斯米尔诺夫提出,90年代初期俄罗斯企图照搬西方的宪政体制,但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寡头资本主义的体制。他认为,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构架有两个特点:在形式上十分完备,宪法所规定的条款,如人权、制衡反对派的条款都是相当先进和完善的。但在事实上,这一体制导致了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民意上看,“民主”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讲已经带有了负面色彩,结果是失败的。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威·斯米尔诺夫认为,这个时期改革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通过引入政治竞争和选举取代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非常致命的。如果一开始就把党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机构消除掉的话,也就意味着对官僚体系监督的消除,从而导致了国家的混乱和腐败。

威·斯米尔诺夫指出,叶利钦改革时期,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一部分人是持相当乐观态度的。但事实上,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体制:由于缺乏监督,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迅速集中到高层官僚手里;地方割据倾向也十分严重,联邦宪规定的条款和义务,在地方根本无法得到执行;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拖欠工资现象的普遍存在使俄罗斯社会的公民权和人权受到严重侵害。这种条件下,不但宪法的条款根本得不到执行,在发展市场经济和保障人权方面,在遏制腐败方面也是不利的。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斯米尔诺夫将普京总统上台后的改革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恢复重建垂直权力体制以及恢复法制阶段。这里主要包括:通过选举立法以及《政党法》进行修改,以及采用政党原则来任命总理、政府及地方行政首脑的措施来提升政党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修改立法重新分配中央、地方财政比例;提出寡头应该和政权保持同等距离的同时,对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将上层的精英整合到自己开始对统治阶层进行重新建构。

普京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针对腐败问题、司法体制等问题进行改革,即通过组建社会院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到政治、经济决策执行的过程当中来。把总统直属的人权代表改组成为人权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等举措,建立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加强监督,以遏制管理机构出现腐败。

纵观俄罗斯近20年改革的历程,与会学者对此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张树华认为,将民主化的进程等同于现代西方政治模式,忽视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必将使政治改革陷入不发展的“陷阱”。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民主改革是历史的倒退。而